

## 立法的“条件”意识与“时机”权衡



■知无不言  
世间可还有真老实的侠——重读鲁迅先生两篇杂文

鲁迅先生“流氓的变迁”想必是很多人都读过的，文章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流氓是如何逐步演变的历史画面。战国时代，“墨子之徒为侠”，多尚武，但“惟侠老矣”。可是待后来真正老实的侠被专门借权贵之力而“取巧的侠”替代后，也就多为权贵们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便成为了他们效忠权贵的信条。久而久之，侠气消失，盗气浮出，但“绿林好汉”仍属侠流，盗气也是需要勇气的。等盗气也没了时，就只会冒奴气了。尽管奴才只会为虎作伥，惟“主子”马首是瞻，但对“主子”之外的势力也不是不分软硬而一概嚣张的，于是乎，奴才就变成了流氓。

在“打听印象”中，鲁迅先生痛快淋漓地鞭笞了中国人喜欢打听新来的外国名人或国人对中国印象如何的所谓“脾气”。他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讲学时说的一句话，令人回味无穷：“你们对我这么好，就是要坏话，也不好说了。”这话被“打听印象者”们视为“滑头”。在我今天看来，说罗素滑头也并不冤枉，吃着你的喝着你的，能说你不好吗？但这不等于他就没有别的印象，如果非得使其说出来，可能就“没下顿”了——“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是也！当然，“滑头”的代价是其原则立场的丧失，对有些问题就可能视而不见，见而不言，甚至言非所见。

眼下某些被社会捧得“不一般”而自视也“不一般”的专家学者的言行，更让我深刻地理解了鲁迅先生这两篇杂文的深刻寓意，也就更钦佩这位真文豪那入木三分的观察与批判能力。

最近，先是有着“不一般”的“官员学者”(有着官方行政机构的职务与身份者)宣扬中国农民工(初等劳动力)的工资上升得太快，明反对大幅度提高这些劳动者的工资；继而又批评媒体“太过煽情”，反对公共财政出资兴建“平民医院”。这明显属于视而不见的论调！话出口前，可曾认真分析过农民工的工资到底在过去几年增长了没有，可曾仔细地横向比较过农民工报酬的相对变动状况？说农民工的工资高了，就不意味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雇主相对少了吗？而雇主尤其那些大中型雇主是什么人？相对的富人，权贵或新贵！

如果说为弱势群体呼吁便是“太过煽情”的话，那国内的媒体“煽情”远远不够。因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以媒体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为先导的“公共领域”逐步扩展须臾不可缺，没有“公共”性的充分体现与“市民社会”的应有发展，没有弱势群体声音不断呼出的有效空间，就不可能建立起可持续、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至于“平民医院”，自然含有更多公共财政补贴的色彩，它的存在自然会减少非平民医院所应得到的财政补贴，富人自然不乐意。但是，学者尤其是那些在政府研究机构任职的“官员学者”，在发表意见建议时，难道不该充分考虑社会公平公正与效率的均衡？

笔者特别想提出的是，近些天来所闻所见作为反映民声的“两会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代表”的某些“官员学者”的某些言论，个别代表针对诸如城市拆迁补偿、“春运”火车票价调整以及农民工利益的民生问题所发表的观点，弥漫着一股拿弱势群体利益不当回事甚至当牺牲品的气味。在这些涉及当今中国社会公正的敏感问题上，特别是作为财富承载与增值的主要化身的土地，于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法制尚不健全的现阶段，在被集中过程中是最需要考虑原城市居住者与农村耕种者的利益补偿问题。站在仅仅是较为初中等水平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当今，完全可以预期的是，伴随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长驱直入，土地增值的后劲非常强大。所以，即使对现今让出土地者予以大幅度补偿，过几年再回头看，都可能是十分的不足，更何况过去与现在的征地补偿实在是少得可怜。更引人关注的是，这些让出土地者是占社会大多数的相对不富或者较为贫穷的弱势群体，如果他们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和与时俱进的增长，就会形成被“贫民窟”包围的城市，这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和谐与稳定。

让人纳闷的是，这些在改革开放之初曾颇具批判精神的学者，怎么在财富大大增加、社会阶层贫富明显分化的今天，却再也找不到原来那点“侠气”了呢？莫非真被鲁迅言中，既然权贵帐下好生活，何必再四处闯荡江湖做“有上顿没下顿”的窘迫“游侠”，以至“真老实的侠”越来越少，“取巧的侠”越来越多？至于条件嘛，自然是为那些“好生活”供应商们摇旗呐喊了。而且，或者也正如罗素的感受，这些人可能从前持有某种批评性意见，却架不住被某一阶层包围后那种舒适感的诱惑，因而被问及对这一阶层或同其相关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问题的“印象”时，只能“你们对我这么好，就是要坏话，也不好说了”。

在深深感佩鲁迅先生的锐利眼光之余，实在还有忧虑。因为按鲁迅先生的推断，“奴气”之后，就离流氓不远了。但我又实在是从心底里希望某些学者，尤其是有着政府官员身份、由公共财政发工资的那些“官员学者”，千万不要步上鲁迅先生所讲的“变迁”路径，真心企盼他们俯下身子，走进最基层的普通民众之中，多观察多倾听，多些“真老实的侠气”，凡事想好了再说，慎言，慎言，再慎言！

现代经济学并非就不注重仁慈与正义，不妨听听鼻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谨慎的美德；对别人幸福的关心，要求我们具有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种美德约束我们以免受到伤害，后一种美德敦促我们促进他人的幸福。”

笔者特别想提出的是，近些天来所闻所见作为反映民声的“两会

### ■经世论衡

◎夏业良  
北京大学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草案案在“平等保护”原则之下又注重保护国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者应被追究责任，这也体现了宪法有关保护公有财产的精神。只是做起来，恐怕还很不容易。当一位起草专家被记者追问“当某一具体物权发生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利益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哪一种”时，这位专家除了重复应当平等保护的原则，对究竟如何裁量却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物权法的根本意义在于个人、企业合法创业、经营和创造财富、保护财富，继承财富、转移财富提供制度性保障。物权法的实际效用往往体现在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方面。从保护主体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社会成本上说，私有财产保护较为直接、迅捷，保护成本较低，且主要由私人承担，而对公有财产的保护则需要长期维持和激励保护主体代理人的自觉与积极主动，确保监督机制的有效运转，承担财产追索的责任，往往耗时久远，效率不高，并且其保护成本高昂并由社会整体(全体纳税人)承担。最近15年来，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就是体制内保护低效或无效的有力见证。

对许多城市居民而言，物权法涉及其切身利益的典型例子是小区车位、车库的归属问题。草案案几经修改，目前的规定是“由当事人通过出售、出租或者附赠等方式约定”等，较之以前的条文，更具可操作性。物权法中涉及的“有关法律”，还包括经济法的规定。比如私人不能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既定原则，从昔日公开讨论的禁区逐渐演化为对条件与时机的权衡阐释，个中涵义不可低估。

建窑、建坟等等，都属于经济法的规定，物权的主体都应当遵守。

法律是需要不断完善。既便物权法在本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诸多从现阶段国情出发的规定或没有规定的事项，可待时机成熟时进一步修改、增加，亦可为今后修改有关法律和调整有关政策留有余地。如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问题，相关改革正处在继续深化过程中，现在物权法对这个问题还难以做出具体的規定。

物权法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草案此前修改过程中，对这两权的转让能否放开，存在不同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部门反复研究并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后认为，我国人多地少，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因为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的保障。从全国范围来看，放开两权转让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法律委也并没有否定在未来条件成熟时放开的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在立法决策和解释过程中，注重强调立法的条件和时机，而不是一概否决未来变更之可能性的做法，是这次两会有立法讨论中的一大亮点和进步。有关在中国大陆的法律环境中私人不能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既定原则，从昔日公开讨论的禁区逐渐演化为对条件与时机的权衡阐释，个中涵义不可低估。

### ■管窥一得

## 国际金属价格越来越迷惑

我山东老家的一位亲戚，这几年做金属生意颇为成功。春节回乡时，还曾与他在酒桌上探讨过一番。前些天他忽然来信谈他对近期金属市场的困惑：

这几天金属价格一天一个价。还是涨，完全脱离了其实际价值，但库存却很低。这么高的价格感到风险很大，而极低的库存又感到价格还会涨。不知道现在是存货好还是观望好。昨天又在网上看了关于2007年全球经济的预测，好多人认为本轮经济周期已见顶，今年全球经济有很大变数。不知方向了。

我觉得他的困惑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同样面临的问题。我于实业投资完全是门外汉，但一直也在关注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因为这是近些年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就回信跟他讲了我的看法，也算一番探讨。说实话，我比较忐忑。上行还是下行对我们来说无非是判断正确还是失误的问题，但对他们来说却是收益增加还是损失增加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你的疑惑很正常。经济学家对未来形势的判断往往是截然相反。这不是水平能力的差异，而是现实中的变量和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有反转或者失败的可能。这对你这些做实业的人来讲就增加了不确定性。

预测金属、油价，我以为可以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可持续的。现在全球收紧流动性的趋势明显。美国经济今年放慢速度已成

定局，欧洲央行也刚刚再次提高利率，中国货币当局对流动性过剩的控制决心亦很大。但日本央行态度不明朗。总体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比去年有所下降，但不是很大的衰退，应当被视为平稳增长。至于是否见顶，还要看2008年之后的情况。依我看，即便2008年增速再次放慢，依然是平稳回落。

第二，由于存在大量的衍生产品，相对于实体经济层面，金属市场的运行已经有了很大的独立性。即使实体经济当中供给需求没有出现大变动，也可能因为预期变化而导致某些题材成为炒作对象，比如中国需求。一旦这样的预期形成，就会有大量的资金进入期货市场。

目前的情况应该是这样。但是，暴涨必然伴随超跌，没有真实需求的支撑，题材炒作只能是一时。此时面对金属的暴涨，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作为个人投资，宁可少赚，不能多赔。风险控制第一，收益第二。心态特别重要。只有在每次暴跌时不亏损，才能保证总体上的收益。

金属市场应该有其自身的周期，价格也肯定是波动的。从150年的周期来看，金属的真实价格是下降的。但长期趋势对我们来说几乎没有意义，关注两三年内的趋势就可以了。

第三，金属、石油这些大宗商品，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石油是工业血液，铜、铝、镍等金属是武器装备的重要原材料。一旦有局部战争可能性，这些金属价格必然短期内暴涨。但是，国际市场应对这些短期暴涨的措施也值得关注。石油价格在战

争期间不一定都是上涨的，国际社会对此已经有联合释放库存来稳定价格的成功经验。但金属市场我还没有看到类似的成功稳定市场的事件。

国际政治局势对金属市场的意义更大。但诸如罢工之类的影响，我觉得是短期的。重要的是那些可能影响半年乃至一年的事件。

第四，不妨多关注一下国际上主要的金融机构的舆论动向。这些机构有的是直接利益相关者，有的是局外人。很多机构都是先埋仓，再唱多。这本来无可厚非。正是因为他们看多才会事先埋仓。但对这些机构也不要迷信，他们很多判断在很多时候是错误的，其中也不乏巨亏者。

预测是一门艺术。我个人以为，只要有一丝不确定性，就多看少做。只要自己觉得有把握，就可以放心去做。只要你觉得买入价格的符合这个商品的真实价值，大可对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波动放心。

金属市场在经过一轮暴涨之后的回调之后，仍然会震荡上行。大宗商品往往在价格暴涨后回调幅度很大，回调50%的可能都会出现。但回调后的上涨空间可能更大。而天生具有强烈稀缺性的贵金属可能更是如此。具体的品种你比我更熟悉。我这些观点仅供参考。祝好。

### ■人在基金

## 是被“挟持”，还是去积极引导

春节后大出意料的“黑色星期二”，引起各方面从各个角度的思考，其中一个推论就是基金重仓股的暴跌是引发此次大盘暴跌的原因。

本栏不讨论这个推论，笔者琢磨的是在基金重仓股暴跌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是基金看空市场主动性抛售导致重仓股呢，还是由于基民面对市场恐慌而赎回导致基金不得不出售一些股票来应对？如果是后者，则显然基金或基金经理已经不能按自己的思路对待市场，因为解决投资者的基金赎回是第一位的；而主动性抛售股票如果是借市场异动机会调整行业或股票配置，则显然也没有对市场存量资金产生多大影响。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在，基金发行日趋火爆的背后，是基民的疯狂涌入，而新涌人的基民恰恰是市场的新手，追涨杀跌、遇市场波动而恐慌加剧，是这个群体的普遍市场心理和行为，如此，整个基金行业就面临一个新问题：基金可能“挟持”基金。

具体而言就是：对市场看空也好看多也罢，基民的“挟持”，将淡化基金经理因对市场的判断从而采取的市场行为，也就是说，更大程度上基金投资会出现与它怎么预期市场无关的股票买卖行为。比如，哪怕基金经理认为市场暂时高位不适宜加仓，但基民不这样认为，还是持续买入基金，逼着基金继续买入股票以适应基金合同对股票投资比例的要求；再比如，如果基民看空股市或者受股市短期剧烈波动影响而较大规模赎回，则哪怕基金经理认定是短期波动而已或者甚至认为是继续建仓的好时机，但因为投资者的较大赎回而无法实施。应该说，上述情况基金在过去也遇到过，但目前随着基金规模爆炸性的增长，这个矛盾将凸显出来。

我们知道，根据市场评价体系的要求，基金必须面对公开排名，除了一年、一个季度的排名，也有每月、每周甚至每日的排名，虽然基金管理公司内部也许不会受这类短期排名的影响，但总不得不顾忌社会、市场对短期排名的看法甚至压力。所以，基金操作就会存在某种不谋而合的行为，要看好的时候都看好，看不好的时候都不看好，尤其在互相比较短期业绩的时候。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不管是恐慌性的赎回还是热情过高不计风险的申购，

◎刘传葵  
宝盈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博士 政府特聘专家

一定程度上都扭曲了开放式基金随时申购和赎回的优点，把本来是对基金经理人“以脚投票”的优点扭曲成了伤害投资者自身和基金本身业绩表现的通道，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更加极端的情况是，银行在理论上存在挤兑，开放式基金也存在一个极端的赎回情况。尽管投资法规对基金已做了安排，比如强制性持有5%的现金、对单日赎回金额的上限要求等，一旦出现大规模极端的赎回，不仅对基金投资甚至对整个基金行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近期证监会基金部下发《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行业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的通知》，是非常及时的明智之举。通知要求帮助基金投资者做到的“五个了解”(了解证券投资基金；了解自己；了解市场；了解基金发展历史；了解基金管理公司)，是非常精炼的基金投资指南。而通知要求各基金销售机构必须制作统一标准的宣传推介材料和《风险提示函》，鼓励基金销售人员在销售中主动要求投资者确认阅读《风险提示函》，也是非常具体务实之举。

按照基金运作的基本理论，基金是受人之托的理财，按照基金合同要求，在募集资金后有完全的基金财产处置权，但在大规模的申购或赎回中，确实使基金投资受到了来自于基金投资者本身因素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基金投资者的行为不仅事关投资者自身利益，也深刻影响着基金本身投资的业绩表现。所以，引导投资者大众，既是为大众利益着想，也是确保基金在规模相对稳定基础上去投资运行的需要，须知，追求规模的稳定性，基金管理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是一致的。只有明白这一点，基金管理公司才有开展投资者教育的经济利益冲动和积极性，才有可能持之以恒。而引导基金投资大众，显然是基金公司少或不被基民“挟持”的充分必要条件。

### ■排沙简金

## 两个联想，哪个更真实

联想全球化的每一步，不管这一步是成功还是不成功，都是一笔财富。正因为联想的标杆意义，才有了我对联想的观察系列。当然，我没有条件切入联想的实际操作过程，具体细节的较真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我更关心联想经验的方法论意义。

通常，那些公司运行中的真问题，在真正找到解决办法之前，是任何一个公司都要刻意要隐藏的。一如没有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脱裤子来缝补。局外人很难看到真正的棋局。联想集团在2006年总结中高调宣示，“联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坐标，成为中国企业冲向海外的象征，更寄托了国人对中国企业国际化时期的期盼”。而如今代表大股东在联想集团行使“执行董事”权力的柳传志春节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话则是：“联想连着我的身家性命。之所以在退出联想集团决策层后着力发展培植另外三家子公司，也是基于分散风险的现实考虑，起码内心不再那么紧张和焦虑了。”“到现在为止，不得不承认，并购IBM PC业务，联想冒了很大风险”。

当现实与自我评价相背离时，一般也是危机敲门时。联想集团年度总结高调宣示的东西与核心人物面见记者所显示出的谨慎与忐忑恰成对比。哪一个所披露的信息更真实？这里面涉及一个鲜有人提及的问题：政客的企业与企业家的企业区别。

今日之政客个个算得上企业家，而企业家个个都跟政治沾边。然而不能因此而把政客与企业家划上等号。政客特别注重形式，一个饭局、一个会议上的座次，可能使他们耿耿于怀。形式就是他们的生命。一如京剧，一个古老套的故事，可以演上几百年而不衰。张艺谋可能就是抓住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把一切为了形式的文化推向极致，因此，形式大于内容(《十面埋伏》)，形式谋杀内容(《满城尽带黄金甲》)，居然特别有票房号召力。政客也是如此。他们在一些场合，常常表现出内心感受的另一面。企业家如果也染上如此习性，就很难存活了。为了企业帝国的壮大，企业家非但不会去恪守形式，甚至可以不要自尊。企业竞争是人类社会最

◎王育琨  
管理专家  
首钢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

为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过程。要想成功，就要具备特殊的战斗力。企业家的奋斗，是一次次“回归零”的过程。不管他先前何等成功，什么时候他不能回归零了，开始自以为是了，那就到了他向下滑行的时候了。

杨元庆所遭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况。靠着营销专业成绩，他一飞冲天。可是到了新的位置上，他猛然发现，政治上的平衡要比专业上的精专更为重要。公司机构大了，什么事都有人具体负责，慢慢地他就被环境推着向着非专业的方向发展了。杨元庆的误区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家的心态。他们在公司做大执掌乾坤以后，意识到要授权，要有所转变，但是大多数却向着非专业化的政治平衡方向转变。而没有意识到应该向着专业化的方向转变，即转变为一个有胆识的战略专家。国际一流公司的领导人，毫无例外都是战略专家。战略专家被新环境赋予了新的规定性，这就是刻骨铭心预定的目标，对途径和方法无限度、无边界。杨元庆不该忘却的，始终应该盯住的是目标，而不是固守那些为了达成目标的手段。战略专家并不是掌握了绝世本领的人，而是那些随时准备扬弃自己的人，准备花一生时间去认真学习的人。最忌讳的是自认为掌握了必胜的法宝，掌握了真理，而应该有着根深蒂固的敬畏。时刻警醒着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没有人比企业家更勇敢、更诚实、更愿意做出牺牲。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如其所是地把握事物的走向，才能最终通向成功。实现目标的意志和好奇心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都可以放弃。

对玩家来说，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起点。所有成型的东西，只能是起点，不是恪守的教条。在失败中摸索前进，这一点容易做到。胜利中舍弃前行，却要有一点更高的要求和准备了。